

党争与乡评旋涡中的江南缙绅 ——明末郑鄮案考论

吕 杨

摘 要: 明末士人郑鄮因被控“惑父披剃”“左道迫父杖母”“奸媳”“烝妹”四项罪名而罹难,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可发现,其被控罪名并不成立,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关于郑鄮案的记载讹误颇多。郑鄮之所以罹祸,其主要原因是郑鄮缺乏政治经验,陷入党争和政争的旋涡。郑鄮在乡诸多不法行径及狂傲的性格,导致其乡评极差,即使在东林内部,对其指责者亦颇多。明思宗刚愎自用的性格、反感党争的心态,以及有意借此案抑制黄道周、打击士大夫清议朝政的行为,则是促成郑鄮磔刑案的关键因素,四项罪名只是借口而已。

关键词: 郑鄮;杖母;温体仁;乡评;党争

作者简介: 吕杨,历史学博士,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明江南社会治安研究”(15BZS061)。

中图分类号: K248.3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9.02.010

郑鄮为明代常州府武进县横林人,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卒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郑鄮万历四十年(1612年)乡试中举,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中二甲第三十名进士。郑鄮少年即有文名,为东林成员,中进士后,参加庶吉士考选,以第二名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成为钱龙锡的门生。随后郑鄮与壬戌科状元文震孟先后上疏反对奏疏留中,锋芒直指魏忠贤,遂遭到阉党的政治迫害,不仅被赶出朝堂,且被列入王绍徽炮制的《东林点将录》,成为“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之一的“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鄮”^[1]。崇祯二年(1629年)“钦定逆案”,郑鄮平反并被重新启用,由于其父母分别于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四年(1631年)去世,郑鄮一直丁忧在乡。崇祯八年(1635年),郑鄮随武进同乡礼部尚书孙慎行进京复职,不久即以逆伦罪被逮捕。郑鄮案先后经刑部、锦衣卫、东厂审理,均未能定案。刑部尚书冯英、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先后因审理郑鄮案不力而落职丢官。最终刑部迫于思宗的压力,将郑鄮拟为斩刑,但思宗依然不依不饶,命令刑部加等,郑鄮被磔刑处死。

郑鄮案与袁崇焕案均是明思宗亲自制造的两起震惊朝野的磔刑案。崇祯三年(1630年),镇守辽东的名将袁崇焕被处磔刑,此事真相在清代即已大白于天下,研究者甚多,学术成果丰厚。由于郑鄮的历史影响力不及袁崇焕,故相对于袁崇焕案,学界对郑鄮案关注较少,除了宇文思理先生对郑鄮案进行过概述性探讨,其他学者一般在讨论东林、晚明党争等领域问题时,才略有提及。樊树志先生认为郑鄮之案是因为其卷入党争旋涡,且又得罪首辅温体仁,遭到温体仁恶意报

复、诬陷所致^[2]。宇文思理先生认为，郑鄮案的悲剧，既因郑鄮深陷党争漩涡，亦因明思宗刚愎自用、“为遏制黄道周而有意为之”；加之“明末官场的风气已无可救药，政治生态已扭曲变形，其黑白不分的政治生态外加皇权可以随意践踏法律的时代局限也造成了郑鄮冤狱的外部环境，外加郑鄮自己的政治敏感度较低就促成了他的悲剧命运”^[3]。郑礼炬先生在对黄道周诗文辑佚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郑鄮文集中存黄道周诗文七百余首（篇），不仅为黄道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同时也为郑鄮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4]。陆林先生通过对金圣叹与武进许之渐、许之溥兄弟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考证出清初文人许之溥的生年、事功，补充和丰富了相关研究，而且又挖掘出很多关于郑鄮研究的相关文献，使我们郑鄮案有了新的认识^[5]。吴琦先生认为晚明乡评不断尖锐化，使乡宦陷入恶评的漩涡，“郑鄮终因居乡多不法而罹祸，乡评成为其定罪之一大缘由”^[6]。王森威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锦衣卫指挥使对案件谳审、量刑所发挥作用的角度，对郑鄮案进行了讨论，认为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试图开脱郑鄮，但被明思宗以玩忽职守之罪革职，导致官员再无人敢为郑鄮申辩^[7]。

上述学术成果，使我们晚明郑鄮案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郑鄮案既是晚明党争的产物，又是典型的皇权干涉司法公正事件，加之郑鄮案相关史料零散，且文献记载中又常见抵牾之处，故笔者通过梳理、分析目之所及的史料，探讨郑鄮案始末，求教方家，以期加深对明末政治史的认识。

一、郑鄮“罪行”考辨

（一）“惑父披剃”

郑鄮出生在常州缙绅之家，从其自撰年谱记述看，其“家世本义门”，“横林之郑，国初自凤阳徙来，传九世”到了郑鄮之父郑振先一辈^{[8]480}。郑振先，字太初，生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卒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9]448}，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科三甲第189名进士^{[10]2382}。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主事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辅臣沈一贯、朱赓，指斥朱赓为“古今第一权奸”，旋即被贬为四川永宁宣抚司经历。是年郑鄮十五岁，随其父入川赴任。“惑父披剃”传言的根源即来源于此行之经历。

所谓“惑父披剃”，顾名思义就是怂恿、蛊惑其父出家为僧。《明季北略》载刑部尚书冯英在审问郑鄮后，奏称“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11]258}。《三戌丛谭》载冯英语为“鄮父振先毁冠茹素二十余年，披剃之事已昭彰入耳目矣”^{[12]484}。清代陆以湑认为郑振先“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仪部遂挟妾以出，流转僧寺，颇为人指”^[13]①。陆以湑是清代医学家，生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卒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其著述时代距离郑鄮案已二百余年，其记述中不免夹杂道听途说或是存在摘抄、转引其他史料之事。因此，我们应通过记载郑鄮案时代最近的两种史料——《明季北略》和《三戌丛谭》来梳理、分析此案。从两种史料的文本记述看，郑鄮之父郑振先似有“披剃”之事。当事人郑鄮对“披剃”一事做了这样的解释：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郑鄮十七岁时跟随其父上峨眉山，郑振先在峨眉与得心和尚一见如故，“观者皆怪，疑有夙缘云，居数日府

①陆以湑此语应是抄录黄宗羲为郑鄮所撰《墓表》词句。参见黄宗羲：《郑崧阳先生墓表》，《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君欲命予及仆南还而自留山中,曰弃家入道,古人所有也”。郑鄮再三恳求,并以祖父母担心为由进行劝解,即便如此,郑振先虽勉强同意不出家,但仍在寺院住了三个月才下山^{[8]481}。郑鄮的《天山自叙年谱》作于狱中,很大程度带有自我辩护的色彩,但即使从古人的角度去分析,剔除近乎神话般的得心和尚未卜先知,派人在路上等候郑振先父子等成分,结合郑鄮乡居时为其父所作《行状》,郑鄮的记述仍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很高的可信度。试想郑振先在仕途春风得意之时,上疏弹劾沈一贯等阁臣,且不论其弹劾的目的如何,结局却是被神宗斥责,从中枢机构的京官贬为边远的四川永宁宣抚司经历闲官,因仕途坎坷而产生的惆怅之心可想而知。郑振先与得心和尚交谈后,“叹人生穷达荣辱,种种幻化已若斯矣”^{[9]449}。在官场失意之际,在佛教名山遇到能“未卜先知”且一见如故的高僧大德,加之成长于佛教盛行、信徒甚众的常州,郑振先萌生落发出家之意也在情理之中。郑鄮称“自云栖还后,府君、吾母俱长斋蔬素,至是以居丧尤虔”^{[8]485},郑振先“意颇悔峨嵋之归,屡欲披发入山。吾母吴安人力劝之,乃修居士净业,不入公府,不见贵游,不冠带,不赴亲戚宴会,旷然如与世隔绝矣”^{[8]483}。天启七年(1627年),郑振先与其妻吴安人“往海上进香以两月”^{[8]489}。可见郑氏夫妇佛教信仰之虔诚。一般来说,人们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受个人成长经历或社会环境影响。无论古今,信仰一般都源于信徒内心,多为信徒个体主动信仰。当然信徒的信仰,不乏受他人蛊惑、影响的事例,但未见有弱冠之子蛊惑、怂恿出身书香门第且满腹经纶的父亲出家为僧的事例。可见郑鄮“惑父披剃”之说难以成立。正如清人抱阳生所言:“鄮父振先,为仪曹时,见中官宰执,互相联结,以中朝第一权奸劾沈一贯,几蹈不测。中心不悔,则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惑披剃为僧乎?”^{[14]876}

(二)“迫父杖母”(“左道杖母”)

郑鄮被处磔刑的罪名即是大逆不道的杖母之罪,四项罪名中,郑鄮最后只认了此罪,当然郑鄮的辩护者认为郑鄮只是迂腐地出于维护其父的声誉而被迫招认。郑鄮的招认和辩护者的辩护,让这个“杖母”事件更加扑朔迷离。若要辨明此事的真伪,必须理清以下三点。第一,郑母吴安人是否是郑鄮生母?因为对于生母和继母,明律的量刑标准并不一致。第二,吴安人究竟是“贤妻良母”还是“悍妇”?第三,向温体仁揭发“杖母”行为的吴宗达与郑鄮关系如何,究竟是不是郑鄮的亲舅舅?

明人蒋平阶^[15],清初人计六奇^{[11]258}、曹溶^[16]、谈迁^{[17]5718}均认为吴安人为郑鄮继母。而从郑鄮自撰的《天山自叙年谱》《亡考彖斋府君行状》《亡妣吴安人行状》,钱谦益所撰《封安人吴氏墓志铭》,以及黄宗羲所撰《郑崧阳先生墓表》中的记载来看,郑振先之妻吴安人为郑鄮生母无疑。

既然理清了吴安人确为郑鄮生母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吴安人究竟是何种主妇。各类文献对于吴安人的记述,非黑即白,一为“悍妇”形象,一为深明大义的“贤妻良母”形象。

1. 悍妇说

茅元仪引刑部尚书冯英的谏语称郑鄮“其父畜有婢妾,其母待之甚严”^{[12]484},黄宗羲认为“仪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18],计六奇认为郑鄮之母“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11]259},陆继辂认为“郑太公有妾颇擅宠,而郑太夫人奇妬”^[19],“杂说所载谓鄮母吴性酷劣,杀婢者屡”^{[20]165}。

单纯从上述记载看,毫无疑问,吴安人是个嫉妒成性且残酷异常的悍妇。

2. 贤妻良母说

吴安人出身于科举望族，“五岁通《孝经》《列女传》，其父简讨公以谓非凡女”，“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廉，教其子以学，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于忠孝大节，凛然不二，沉几远识，则学士大夫有弗如也”^{[21]680}。清人抱阳生亦认为郑母吴安人“以礼教自律”^{[14]876}。郑鄮在《亡考彖斋府君行状》《亡妣吴安人行状》《天山自叙年谱》中对其母极尽溢美之词。钱谦益在其所撰《封安人吴氏墓志铭》中称吴安人在郑振先弹劾沈一贯时，对其夫说：“夫子无辟我，我为弱女时，诸父学士公以论夺情拜杖，血肉狼藉，私心已知壮之，其敢违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脱有不测，老亲稚子乃吾事也。”郑鄮上疏弹劾权阉，吴安人告诫郑鄮曰：“螻虽死，其蜚犹在，子无谓阉败可安枕也。”^{[21]680}从这些记述可见，郑母吴安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知书达理、识大节的贤妻良母。

显而易见，几种史料对同一人物的记述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拨开笼罩在郑鄮身上的“杖母”疑云。

笔者结合相关史料^①，制作了宜兴北渠里吴氏家族谱系图（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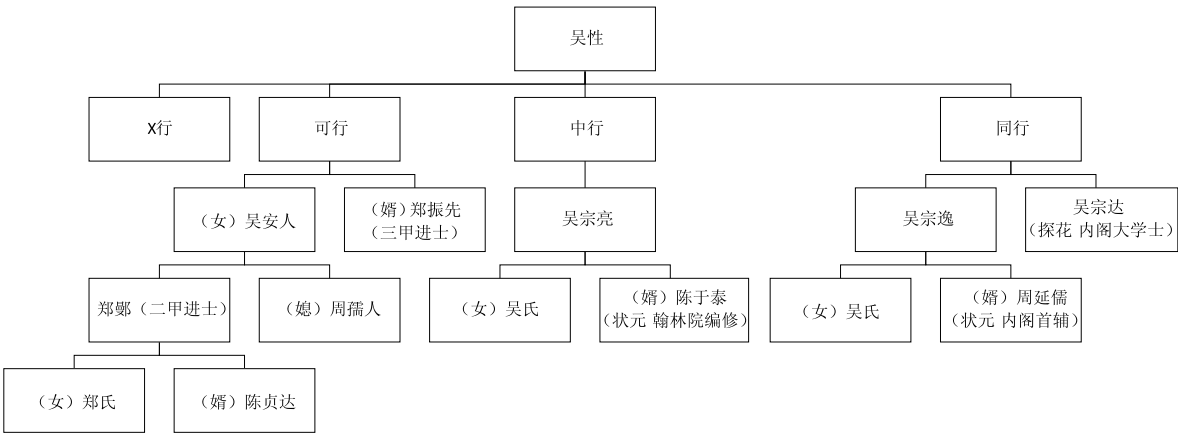


图1 宜兴北渠里吴氏谱系图

从图1可见，吴安人出身于晚明著名的江南望族宜兴北渠里吴氏。吴氏家族科第蝉联，其姻亲家族如武进横林郑氏，宜兴毫里陈氏、周氏等均是当时门第显赫的科举望族。吴安人为吴可行爱女，钱谦益在《封安人吴氏墓志铭》中称吴氏五岁能读《孝经》《列女传》，此说应不是溢美的虚言。排除郑鄮对其母的溢美之词，能看出，吴安人出身名门，其自身修养和眼界，均非一般家庭妇女可比。对于“虐待婢女”的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只要不出人命或酿成重伤（残）的严重后果，根本无人追究。至于不能容郑振先之妾一事，无论是郑鄮自撰《年谱》，还是郑鄮为其父母所作《行状》，以及钱谦益所撰的吴安人《墓志铭》，均确认郑振先曾纳妾。郑氏五子中，三子郑邾、五子郑祁为庶出^{[21]681}。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司法制度下，纳妾并不违法，属于正常的婚姻关系范畴。而且吴安人作为郑振先之正妻，与妾的家庭地位完全不平等，相较于妾，吴氏有绝对的权威。当然，已婚妇女出于对婚姻的排他心理，对丈夫纳妾反感亦在情理之中。对于

①相关文献主要为郑鄮撰《天山自叙年谱》《亡妣吴安人行状》，钱谦益撰《封安人吴氏墓志铭》，以及《宜兴毫里陈氏家乘》等。

郑振先的夫妻关系,刑部尚书冯英在审理郑鄮案后,所作谏语称“虽无行杖之事,亦时有哄嚷之情”,“夫妻反目,家庭之常”^{[12]485}。就吴安人的性格而言,她在乡时“舍居第为寺,柴门疏食,然灯相向”,甚至临终之时还“诵楞严咒,呼子女续之”^{[21]680}。可见吴安人对佛教信仰极为虔诚。一般来说,普通民众笃信佛教者,受佛教因果报应、普度众生等教义的影响,除个别佛口蛇心者,绝大多数为人宽厚、心地善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出身名门、知书达理的虔诚女性佛教徒,会做出“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杀婢者屡”这种残忍到令人发指的变态行为。

既然吴安人“悍妇”之说可能为不实之词,那么这个“杖母”传言是如何形成的呢?郑鄮本人认为此传言形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府君与吾母尽吴山游览之胜,数月归次吴门。府君来晤昆山,遂携予归。归而闻谤议大腾,有言府君披剃者,有言予亦披剃者,又有言吾母亦为尼者,又有言府君为婢妾争哄而起者,纷然无所不有。府君与安人付之一笑,而此谤遂流不歇。”之所以出现针对郑振先夫妇的流言,一方面原因是郑氏夫妻笃信佛教,人所共知;另一方面原因则是此前郑振先曾“买董壁切宅一区,价二千余金。壁切为祖母董宜人从弟,以贫售宅,府君京任时封翁与壁切成契。府君偿价甚艰,而邻居杨氏者谋欲得之。府君素负气,不能让也”,以致出现“盖图宅者为之,有设谋以簧煽者,非无端之流言也”^{[8]483}。流言传播迅速,在传播过程中,又增加了很多人为附会的因素,最终出现《吕氏春秋·察传》中所说的“数传则黑为白,白为黑”的局面。

3. 吴宗达与郑鄮的关系

郑鄮罹祸的“导火索”是内阁大学士吴宗达向温体仁揭发郑鄮“杖母”,那么吴宗达与郑鄮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吴宗达亦是宜兴北渠里吴氏家族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探花,崇祯朝内阁大学士。从图1可以看出,吴宗达并非吴安人的亲兄弟,郑鄮称吴宗达是“堂母舅也,臣母自有胞兄吴宗因”^{[22]320}。吴安人卒于崇祯四年(1631年),按享年五十九岁来推算^①,吴安人生于万历年(1573年),而吴宗达则出生于万历三年(1575年),吴安人是吴宗达的堂姐。计六奇^{[11]258}、曹溶所言“郑鄮继母,为宗达女弟”^[16]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吴宗达与温体仁于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同时入阁辅政^{[23]312}。“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同恶相济,吴宗达奉行两人意旨,毫无短长,时目为箴片。适礼部尚书黄士俊丁未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己未榜眼、探花。京师为之语曰: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黄孔);内阁翻作妓馆,乌归、王巴、箴片,总是遭瘟(温)。”^{[24]52}可见吴宗达在阁时,政治上毫无作为,完全听命于温体仁和王应熊,如同属吏。“温体仁当政,宗达能为之下,在阁六年,交欢无间。”^{[25]2329}温体仁,本传见于官修《明史·奸臣传》,其人“专务刻核,迎合帝意”,“自体仁辅政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26]7935},“怀私结党,误国覆邦”^{[26]7905}。王应熊其人“博学多才,熟谙典故,而性谿刻强狠,人多畏之”,时人认为“应熊强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27]。吴宗达能在阴险狡诈、老奸巨猾的温体仁 and “谿刻强狠”“强愎自张”“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的王应熊身边全身而退,可见其为人圆滑、老于世故,在官场的政治博弈中游刃有余。

①古人年龄以虚岁计算,吴安人去世时应是五十八周岁。

吴宗达于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致仕^{[23]318}，郑鄮则于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廿五日起行”，“十月十三日抵京”^{[8]492}。从吴宗达致仕时间和郑鄮进京时间分析，吴宗达应是在郑鄮进京复职之前向温体仁“揭发”郑鄮“惑父披荆”“迫父杖母”“奸媳”“烝妹”等“罪行”的。吴宗达是郑鄮堂母舅，也算近亲，为何与外甥郑鄮交恶，并欲置郑鄮于死地？计六奇认为交恶的原因是“鄮薄于宗达”，郑鄮居乡时“宗达子说入泮事，为鄮夺去，宗达谓轻己，憾之”^{[11]258}①。对于“鄮薄于宗达的说法”，郑鄮的解释是其父与吴宗达“宦途意见不同，父母向疏往来”^{[22]320}。至于吴宗达之子找郑鄮谈关于入府学一事，似不可信。吴宗达未入阁之前即是礼部尚书，而且又是进士及第，无论社会地位还是声望均远高于郑鄮，即使入府学需要名士荐举，明代常州府文魁星闪耀，“科第蝉联，数代不绝”^[28]，其附郭武进县“科第蝉联鹊起，文风甲于天下”^[29]，人才济济。吴氏家族更是驰名江南的科举望族，吴氏的门婿周延儒、陈于泰都是状元及第，吴宗达之子根本没有必要去求疏于往来的表亲郑鄮荐举。吴宗达致仕前向温体仁“揭发”郑鄮的“罪行”，除了郑、吴两家关系疏远、政见不同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鄮从吴宗达侄孙手中购买了吴宗达祖父的祠堂，导致吴宗达祖母的诰命无处存放。吴宗达闻讯非常生气，意欲赎回，但郑鄮在购买吴氏祠堂的契约中订立了巨额“违约金”，吴氏家族若赎回祠堂，则须赔付郑鄮巨额违约金。吴宗达委托常州官员进行调解，但郑鄮却趁机讹诈，导致吴、郑彻底交恶^[30]。加之吴宗达又见与郑鄮同门的钱士升入阁辅政，可能担心郑鄮与钱士升等结党，对自己及吴氏家族不利，故在临行前为温体仁留下了可置郑鄮于死地的“撒手锏”。

（三）奸媳烝妹（奸妹）

郑鄮的另一罪名，即是被指控“灭绝人伦”地强奸儿媳和兄妹乱伦（一说是强奸亲妹）。郑鄮对这两项罪名至死未招认。无论刑部、锦衣卫还是东厂，在审讯郑鄮时，均未深究此事，明思宗也未在此项指控上大做文章。究其原因，极有可能是思宗和参与审讯的司法官员也心知肚明此事毫无证据，完全是捏造出的罪名，相关史料对此事的史评也持否定态度。

郑鄮次子郑喆幼年即与韩钟勋之女订婚。韩钟勋亦是武进人，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科三甲第86名进士^{[10]1503}，任职湘阴知县。韩女尚未成年，韩钟勋夫妻即双双病逝于湘阴，郑鄮遂将韩女带回常州家中当童养媳。然而韩女尚未成年，即于崇祯七年（1634年）去世，坊间遂传出韩女是被郑鄮强奸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郑鄮自我辩解称，自己将韩女带回家后，因其尚未成年，“令与予外母毛节妇及予第四女同居，其母有所寄于陆，陆欺孤女，无偿意，女索之迫，则大鬩。既鬩，予始知之。陆恨女而及其翁姑。陆者，韩之中表也。论事理，亦殊无谓，当繇夙冤耳。女鬩后，病，伤寒一月死”^{[8]492}②。可见，韩女是与表亲陆氏发生纠纷、争执后，因伤寒病去世，并非自杀身亡。

①清人曹溶在《崇祯五十相列传》中与计六奇观点相同，称吴宗达因诬陷郑鄮下狱，引发“仕路皆为不平，故宗达畏人言以告”的说法是错误的。郑鄮被逮捕时，吴宗达已经回乡，不久去世。参见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宰相列传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9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5页。

②陆某是何人，囿于史料所限，不知其为何名，事迹如何。从与韩氏姻亲关系蠡测，陆某或有功名，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可知，明万历中后期至清顺治前期，武进籍陆姓进士共八人，分别是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陆卿荣，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陆完学、陆大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陆卿任，天启五年乙丑科陆卿正，崇祯四年辛未科陆自岳，崇祯十年丁丑科陆自岩，顺治四年丁亥科陆有声。这些人皆出自武进科举望族陆氏，因未见相关史料，此处只能存疑。

至于“姝妹”(奸妹)之事,则更加荒唐。计六奇称:“至奸妹一事,崧阳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复适钱氏之子。妇人无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谈无行之妇人,何所不加?”^{[11]261}①郑振先与妻妾共育五女,“一适廩例太学生薛卫生,云南布政使又损公子;一适庠生白之珩,福州知府虞都公子;一适南京工部主事陈贞达,都察院左都御史中湛公子;一适庠生吴虞虞,太学知白公子;一适庠生吴直思,大理寺卿严所公子”^{[9]454}。可见,郑氏五女均与当时的名士联姻,嫁入门当户对的官宦望族,根本无一人嫁入钱氏,不知其妹“无行”之说,从何谈起?可能是计六奇误信了坊间传闻,导致记述错误。

那么荒唐的“奸媳姝妹”的指控是如何出现的呢?郑鄮在自撰年谱中称许曦“自具疏亟上,妆点暧昧,极其秽褻”,“曦等更深一步,则申成秽恶小说,嵌人姓名”,“陆完学七十四岁之翁,深狎诸恶少而成之”^{[8]494}。在审问时,“许曦、杨琛等冠带衣巾,跳舞于堂上,摇扇指画,如说书,又如降巫”,信口开河,肆意诬枉,而“金吾憊不敢忤”^{[8]495}。清人梁章钜认为温体仁指使武进籍在京生员许曦、武进籍兵部尚书陆完学“编造秽褻歌词,使阉寺上闻”,故意激怒思宗^{[20]166}。

此外,东林党魁孙慎行,一直被朝野上下誉为正人君子,“操行峻洁,为一时缙绅冠”^[31]。孙慎行不仅与郑振先科举同年,而且又与郑氏是同里近邻(从常州青果巷残存的孙、郑故居的历史遗迹看,孙、郑两家距离不超过三十米),与郑家关系非常密切,对郑鄮一直很器重,郑鄮进京复职即是在孙慎行的再三催促下成行。倘若郑鄮有“惑父披剃”“左道迫父杖母”“奸媳姝妹”这些不齿行径,作为郑家的世交、近邻,孙慎行不可能不知道,以孙慎行的为人,绝不可能对郑鄮如此器重。

二、郑鄮罹祸原因试探

(一) 郑振先父子与晚明党争

明代党争,早在朱元璋建国之初已见端倪,出现了浙东与淮西之争。成化时期,李孜省“假扶鸾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提拔了已致仕的刘敷、黄景、尹直、边镛诸人^[32]。李孜省的行为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即以地域乡情为联系纽带,结党营私,从而开启了明代党争的先河。清代史家认为:

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结援、庇其乡里、连及闾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夫人臣植党树援,未有不害于国者,然多以学术意气,私相矜许,久之,乃成角立之势。若孜省者,一佞幸小人,习五雷道法,迎合宪宗意旨,与奸僧继晓窃取尊显,偶假扶鸾仙鬼之伎,遂开朋党比附之门,使朝局为之一变,可不慎欤!^[33]

嘉靖大礼议后,世宗深居后宫进行斋醮活动,不见大臣,使君臣之间的沟通只剩下文书往来

①郑鄮岳父周士英亦武进人,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三甲第四十六名进士,曾任义乌知县、吏部郎中等职,并非礼部尚书孙慎行,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关于郑鄮之妹和郑鄮岳父的记述实为谬误。参见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15页。

一途，其结果是造成了君臣相疑、君臣相隔和朋党之争加剧。由于嘉靖时期内阁地位上升，内阁首辅成了朝堂中各种政治势力追逐的目标，由此拉开了争夺内阁首辅的序幕。万历中期开始，由“争国本”而引发神宗深居内宫，不见大臣，导致当时朝堂中以地域乡情为纽带形成的齐、楚、昆、宣、浙、东林诸党相互攻讦。自此，“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置之死，而国事所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轧”^[34]。郑振先在礼部任职时即上疏弹劾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将朱赓指斥为“古今第一权奸”，随即遭到贬官的处分。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不仅是内阁首辅，更是当时浙党党魁。郑振先遭此政治报复，一直未能翻身，丁忧后一直居乡，直至去世。郑振先未能再获提拔，重入中枢，一方面固然与其被贬官后心灰意冷、笃信佛教、淡薄仕途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陷入党争漩涡有着密切的联系。郑振先虽是东林“大本营”常州府人，又与东林骨干孙慎行是同年、同里的好友，但从目之所及的史料看，未见其是东林党人的记述。魏忠贤指使王绍徽炮制的《东林点将录》，将郑振先的好友孙慎行、子郑鄮、亲家陈于廷列入“黑名单”，却未将郑振先列入其中。郑振先虽与东林骨干成员交往甚密，但他和东林的反对派昆党党魁顾天竣非常要好。郑振先弹劾沈一贯、朱赓，顾天竣不仅知情，而且还参与其中；郑鄮中举后亦多次问学于顾天竣；顾天竣还为郑振先之母董宜人撰写过碑传^[35]。

郑鄮入翰林院后，因为上疏反对留中，弹劾阉党而被赶出朝堂。钦定逆案后，郑鄮平反，官复原职。因连续丁忧，长达七年未入京赴任的郑鄮没想到，自己会不由自主卷入党争漩涡。在钦定逆案后，虽然东林在天启朝受迫害的人士尽皆平反，但朝堂上依旧党祸不休，“东林、浙党各有簿籍，开列应用应处诸人，持局者前人贻之，后人以此为心传授受，奕世不敢少变”。由于郑鄮为“东林名彦若黄道周、文震孟、刘宗周辈咸相引重，浙人谋处之尤急”^[36]，可见是时党同伐异之剧。而且明末党争在很多事件上，根本无是非观，一般都是意气之争。

郑鄮与文震孟、黄道周、倪元璐等东林骨干既是同年，又是好友。而郑鄮既与东林党魁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于廷、前内阁首辅周延儒有姻亲关系，又和前内阁辅臣吴宗达有亲属关系。同时，郑鄮不仅与孙慎行同里，此番又陪同孙慎行一同进京复职。孙慎行是东林党魁，万历时期即是礼部侍郎，天启初又升任礼部尚书，此次进京很可能入阁辅政。以孙慎行的资历，如果入阁，首辅之位非其莫属。因此，“忌孙者因而忌郑，以孤孙之党”^{[11]261}。加之文震孟、何吾驺已入阁，现任阁臣钱士升与郑鄮又是同门、好友，如此显赫的背景，郑鄮自然成为东林反对派的众矢之的。

郑鄮在乡时，清议朝事，品评阁臣。崇祯四年（1631年）、五年（1632年）时，朝堂中“攻击宜兴（首辅周延儒）、乌程者甚众，郑因昌言，宜兴决不可留，而乌程实可大用”。也正是这个原因，钱士升向温体仁极力赞誉和推荐郑鄮^{[24]61}。因此，温体仁对待郑鄮的态度，最初是试探和拉拢。然而，郑鄮入京后，在拜会温体仁的交谈中，郑鄮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使温体仁感到不安。郑鄮在《天山自叙年谱》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谈的内容：

及见阁于朝房，体仁足恭作折节状，执予手低问曰：家居久矣，静观必审，将何以教我？近日南边清议如何？予直应曰：人都说有君无臣耳。体仁愕然，则曰：公不知天下事做不得，又无人材。予应曰：从来无不可为之时，无不可用之人，做不得三字，不知误了多少老先生，如何作如此说？体仁微张其手曰：人材到今日可谓绝无。予曰：有

人则能做事,有用人之人则有人。人材成色,原不能足,能用则三五分人材,可有八九分之用,不能用八九分人材,不能得一分之用。体仁曰:如公言,边防荡寇,此当如何做起?当用何人?予曰:某老于山中,人材非所敢知也,若论做事,则防边荡寇,必须兵将。今庙堂之上,但言募兵,而不言练兵。但言用将,而不言选将。如何做得事来?老先生当择能练兵之人而任之为将,能选将之人而任之中枢,则此两事非难。萧何之识韩信,岳武穆以五千破兀术十万,亦只要办得眼法手法清耳。体仁色大变,拂然而起,曰:公与文湛持同任国家事罢,我久要归了。予曰:老先生下问,某不敢不以正对也。^{[8]492-493}

可见,郑鄮毫无政治智慧。在交谈中,他“意锋芒如刃”^{[14]876},直指温体仁压制人才且行政能力低下,甚至有自比名将韩信、岳飞之嫌。事后,可能郑鄮亦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些过,但又“逢人肆诟言”,荒唐地采用“以攻为守”的方法进行“补救”。陆世仪认为郑鄮不过是“特用虚声为咒吓耳,未见施行也”。然而,郑鄮的做法让温体仁感到极大威胁。文震孟、何吾驺被赶出内阁后,京城舆论大哗,郑鄮“亦随众持愤激之论”^{[24]61},温体仁得知后“决计黜除”郑鄮^[36]。

温体仁构陷郑鄮的另一个原因,源自他与文震孟的纠纷。文震孟“以讲《春秋》称旨入阁,体仁不能沮,荐其党张至发以间之,日伺震孟短”^{[26]7934}。因此,文震孟入阁后,最初“体仁每拟旨必商之,有所改必从,喜谓人曰:温公虚怀,何云奸也?”。早于文震孟入阁的何吾驺提醒文震孟:“此人机深,诘可轻信!”果然不出何吾驺所料,“未几,体仁窥其疏,所拟不当己意辄令改,不从则径抹去。震孟大愠,以诸疏掷体仁前,体仁亦不顾”^{[25]2338}。很显然,老谋深算的温体仁将书生气十足的文震孟玩弄于掌股之中。由于文震孟“自恃特简,于温体仁无所依附”,在许誉卿升迁和郑鄮补官问题上,“由拟票相持相激”,与温体仁发生激烈冲突,结果是“体仁夕揭上,明日二相同罢”。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癸丑“何吾驺致仕,文震孟冠带闲住”^{[17]5718}。文震孟在阁时向温体仁提出,“郑荥阳俸虽未足,年资甚深,应进宫坊。体仁赧然变色,袖出一揭,拱手谓震孟曰:正有一揭上达,欲借重大名,今若此则不敢烦亦。推案而起,某月日首辅温体仁于弘政门投进《特纠灭伦词臣揭》”^[36]。在钱士升面前,温体仁故伎重演,对钱士升说:“今为郑某事具疏,当与老先生问题。嘉善欣然,及取视则纠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词。乌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愿预也。遂独具名以进。”^{[24]61}文震孟离阁仅三日,郑鄮被逮捕入狱。

(二) 郑鄮为人与乡评

郑鄮虽然出身宦宦之家,才学出众,被誉为“名士”,但政治生命极其短暂,其人生多数时间是在居乡和游历中度过的。作为江南缙绅,郑鄮为人究竟如何?为何陆完学、陆来复、许曦、杨琛等同乡和亲属吴宗达必欲置郑鄮于死地而后快?郑鄮居乡时,是否为富不仁,为害乡里?虽然目前尚未见直接记载郑鄮居乡行为的史料,但也可从间接记载的文献中管窥一二。

曾任锦衣卫指挥僉事、参与过郑鄮案审理的王世德,在甲申之变,京师被攻破后,携家眷南逃,“至毗陵,询其乡人”,得知郑鄮“居乡不仁,淫乱肆恶,乡人言犹切齿”,认为“野史尚为回护,真不可解”^{[34]16}。王世德是直隶大兴人,军户出身,世袭锦衣卫指挥僉事,在笔者所见的史料中,未见其与温体仁、郑鄮存在交往和利害关系,而且王世德是在明亡后路过常州,询问郑鄮乡人。其询问目的,可能是由于王世德曾参与过郑鄮案审理,出于对此案好奇的缘故,又或是出于其既往职业习惯的原因,因此他的记述应是客观的。

李清在刑部任职时，同事王章也是武进人。王章在同李清的交谈中，言语间表现出对郑鄮极为鄙夷的态度。当李清向王章问及孙慎行看重郑鄮的原因时，王章答曰：“宗伯喜读书，左右数人无不饱鄮贿，每宗伯阅某书，必驰报，越数日往谒，凡宗伯帐中之秘，鄮皆口诵如流，宗伯因大服，不知其阴习也。”^{[37]18}王世德认为黄道周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郑鄮辩护，是因为黄道周受郑鄮愚弄、蒙蔽太深。黄道周路过常州时，“一日母邀道周，至中堂流涕言鄮至孝，为外人所诬，喃喃数百言，激切动人。道周于是深信不疑，力为称誉，不知其母非母也，扮母以欺道周耳”^{[34]16}。李清的记述与王世德大同小异，他认为郑鄮贪横，“惟同年黄翰林道周偏信之”，李清向郑鄮“同里之贤者”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是“黄尝寓鄮家，渠皂幄瓦器，事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询母数四，或膳或药，皆躬亲。及黄与眷属行，鄮又奉母亲送，煦煦承颜。黄太夫人曾谓黄曰：尔事我能如是乎？母先辞归，惟鄮不忍别，作数日送。一日，忽愀然抚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须臾，僮至，果以太夫人病告，遂仓皇归。或曰，彼舟中母，亦假一老姬为之”^{[37]18-19}。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郑鄮则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是一个惯于伪装的真小人。

郑鄮在其自叙年谱中，记载了两件与乡里纠纷的事。

一件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是买董壁仞宅一区，价二千余金。壁仞为祖母董宜人从弟，以贫售宅，府君京任时封翁与壁仞成契。府君偿价甚艰，而邻居杨氏者谋欲得之。府君素负气，不能让也”。其后，即流传出郑振先“披剃”“妻妾不和”等流言，郑鄮认为“盖图宅者为之，有设谋以簧煽者，非无端之流言也”^{[8]483}。此房产纠纷，绝非郑鄮表述的那样简单。文中的董壁仞邻居杨氏与后来同许曦一起参与构陷的杨琛是否有亲缘关系，囿于史料所限，不得而知。但从常理推测，售房者董壁仞与买房者郑振先是堂舅甥关系，亲属间私人房产买卖，与邻居毫无关系。之所以遭到杨氏的强烈抵制，很可能是郑、董之间的房产交易，造成了杨氏的重大损失，否则作为邻居，杨氏没有任何道理从中作梗。

另一件是天启二年（1622年），郑鄮进京参加会试、殿试时，“家有世仆顾伦之子顾启行。当予祖时家式微，跋扈逸去，营为台州府幕，予祖几为所侮。其官以墨败归，被宪访，启行以为府君置之访也，日夜谋弑主报复。已而启行第四子为启行所逐，乃自投靠府君，契称世仆。启行闻之，益复大恨。见予文名颇著，谋遣其婿郁姓者持谤帖讼予，使不得入场。其人中途乘骡而坠，足损不能行。比至京，则榜出已五日矣，遂废然而返。闻其来又有与逆奴合而使之者”^{[8]486}。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逆奴启行讼府君于按使者，盖有大力者主之。然奴之实不可掩，又诬杀其第四子。不知其子自靠府君未三月，府君悟为逆孽，遂屏之不复用，自死于家。府君久不入公府，与逆奴理皆予代之。按君潘公批云：以仆讐主，真三吴大变也。凡一年始结”^{[8]488}。明代后期，江南缙绅之家蓄奴之风盛行，“人奴之多，吴中为甚”^[38]。郑氏作为江南缙绅，豢养奴仆不足为奇。且顾伦、顾启行父子为郑氏世仆，对于奴仆背主而去，明律自有处置和追究的法律条款。顾启行的新主“以墨败归，被宪访”，完全是官场纠核贪腐，即使是郑振先去纠核台州知府，也根本谈不上主家报复逃离的仆人，况且郑振先亦从未担任过科道官。郑鄮认为，由于“启行第四子为启行所逐，乃自投靠府君”，顾启行因此心生怨恨，于是“谋遣其婿郁姓者持谤帖讼予，使不得入场”。郑鄮的这一说辞，即使成立，主谋顾启行要和郑家有多么深的血海深仇，才会采用如此手段？顾启行第四子来投郑家，结果是被郑振先“遂屏之不复用，自死于家”，其“自死”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虽然我们不排除明末江南奴仆在主家式微之时有趁火打劫的可能，但从发

生纠纷时郑振先、郑鄮并未削籍的状况看,奴仆趁火打劫、恶意诬告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连郑氏家族的人都认为郑鄮四弟郑一谦横行乡里,其人“虺蜴为心,豺狼成性,挟父兄之势,肆其凶恶”,“童婢家奴,多作含冤鬼魂。逼人妻,夺人女,怨深载道”^{[39]506}。由此可见,不仅郑一谦为害乡里,是当地恶霸,而且从其“挟父兄之势,肆其凶恶”来看,郑振先、郑鄮父子亦似有为富不仁、为害乡里之嫌。

再看郑鄮为人,且不论其在常州接待黄道周时的表现是真是假,从其与亲朋之间关系的表现,也能管窥一二。吴宗达是郑鄮堂舅,由于郑振先与吴宗达政见不一,郑鄮“薄于宗达”或可理解,可是郑鄮在乡期间,清议朝臣,认为“宜兴决不可留,而乌程实可大用”的评点则有些过分。内阁首辅周延儒之妻的祖父是吴同行,翰林院修撰陈于泰之妻的祖父是吴中行,郑鄮的外祖父是吴可行,同行、中行、可行三人为亲兄弟。也就是说,郑鄮与周延儒、陈于泰,不仅是常州府的同乡,而且还有较近的姻亲关系。远在江南常州的郑鄮清议朝事不足为奇,但攻击周延儒则表现得有些“六亲不认”。虽然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在官修《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物,但周延儒在崇祯初年既非东林,亦非阉党,政治上虽无建树,但也未祸国殃民。郑鄮攻击周延儒,似与“正义感”无甚关联。周延儒于崇祯六年(1633年),因为与监军宦官王坤发生矛盾,被温体仁以阴谋手段赶出朝堂。在和王坤发生争执的过程中,陈于泰曾上疏为周延儒辩护。结果,陈于泰因其家中豪奴引发波及宜兴、武进、溧阳的大规模民变和为周延儒辩护而被削籍^①。论亲缘关系远近,陈于泰与周延儒的关系和郑鄮与周延儒的关系一致,但二人表现却极为不同:一个拼命维护,一个则落井下石。文震孟之子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记述钱士升在征得温体仁同意后,致信郑鄮,邀其即刻来京赴任。郑鄮写信将此事告知文震孟,但文震孟为避免郑鄮搅入朝堂中的政治争斗,“力阻其来”,导致郑鄮对文震孟“有愠心”,认为文震孟不如钱士升^{[24]61}。从郑鄮对文震孟的态度转变,不难看出,郑鄮功利心十足,性格反复无常。

在刑部审讯郑鄮时,刑部尚书冯英提出要由在京武进人证实郑鄮在乡时的犯罪行为。在外素以团结而著称的武进人,对于郑鄮的表现却一反常态。刘呈瑞说:“臣本世家子,父母课读,寸晷为惜。自六岁从师,至二十岁联捷,从未敢一刻擅出书馆,郑鄮之事,窗外无闻也。”王章则说:“臣本农家子,离城百里,郑鄮之事,系宦室闺门,草野耳目,实未闻见。”^{[11]262}可见刘呈瑞和王章提供了两边不得罪的证词,并将自己与郑鄮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其余的武进人,上到兵部尚书陆完学,下到生员许曦、杨琛,几乎一边倒地提供了对郑鄮极为不利的证词,郑鄮乡评之差可见一斑。

温体仁最初也只想将郑鄮戍边了事,但“陆完学力持之,以为非杀不可、非立杀不可”^{[8]493}。陆完学当时已七十四岁高龄,官拜兵部尚书,位列九卿,根本没有向温体仁邀功、讨好的必要,但他对待郑鄮的处理,却坚持必杀,其态度比温体仁更坚决。究其原因,“事在闺门,外人不能尽知,即知亦不能尽真者。惟其戚党切齿,是以乡议沸腾”^{[12]485},加之郑鄮“居乡多不法,遂罹此惨祸”^{[11]258}。

至于郑鄮为人,清初长洲遗民徐树丕认为郑鄮“淫丑之行,笔不忍书”,是“古今第一淫恶矣”,甚至认为温体仁虽然祸国殃民,但所做唯一好事就是害死郑鄮。他说:“乌程相立朝,无一

①崇祯六年(1633年),祁彪佳任巡按苏松御史,到任后即着手处理宜兴民变,并在其文集《宜焚全稿》中详细记述了此事件的始末缘由,亦未见郑鄮对此事件的关注和评价。

善事，惟露章劾鄮，下狱论死，此举差快人意。有恶乌程者，并此举而非之，此非能爱能恶之仁人矣！然郑亦素附清流，故有左袒之者，则清流之识，似反不若乌程，不可解也！”^[40]由于晚明时“东林之名日高，附之者日众亦日杂”^[41]，因此，夏允彝认为“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42]。赵吉士则明确指出，“东林之中亦多败类”，郑鄮即是败类之一^[43]。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对郑鄮也持鄙夷的观点，在其为门生所作的七言律诗《陆贡士来复述昔年代许舍人曦草疏攻郑鄮事》中，力誉为许曦起草郑鄮“罪行”的陆来复，指斥郑鄮为依附东林的“宵人”，认为明思宗“燃犀”照出“妖孽”郑鄮，盛赞揭发郑鄮的陆来复、许曦等人为“射隼”的“侠士”。全诗如下：

洛蜀交争党祸深，宵人何意附东林？
燃犀久荷先皇烛，射隼能忘侠士心？
梅福佯狂名字改，子山流落鬓毛侵。
愁来忽遇同方友，相对支床共越吟。^[44]

大儒顾炎武对郑鄮的态度，难道也是因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所致吗？从清初陆来复主动在顾炎武面前“邀功”，讲述其代为起草弹劾郑鄮奏疏的表现，顾炎武赋诗对陆来复赞誉的做法和徐树丕公开指责郑鄮，认为杀郑鄮是温体仁做的唯一好事的行为来看，清初江南士人对郑鄮的态度，并非一边倒的同情，对于郑鄮在乡时期的所作所为，相当一部分士人持鄙夷态度。

三、明思宗必杀郑鄮的原因

清人抱阳生认为杀郑鄮者，“始终温体仁一人也”^{[14]876}。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郑鄮“为奸相所陷，路人知之”^[18]。诚然，郑鄮入狱，温体仁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但如果说郑鄮被杀，是温体仁所为，则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温体仁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离阁，七月去世。而郑鄮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被执行磔刑。温体仁去世后，郑鄮一案又经锦衣卫复审，东厂提督曹化淳主持会审，以及刑部最后定案，一系列审判与温体仁已毫无关系。连郑鄮本人亦认为温体仁也只是想遣戍了事，并不想置自己于死地，只有陆完学不依不饶。

按照《大明律》规定，郑鄮所犯除“惑父批剃”之罪被判定死刑有些牵强，其余诸如“迫父杖母”“奸媳”“烝妹”等罪名，一旦坐实，即是死刑。例如“杖母”，在明律中属于“十恶”之一，为“恶逆”行为，属不赦之罪，如以“师巫假降邪神……一应左道乱正之术……为首者绞”。存在“杖母”行为者，“皆斩”。若强奸儿媳、妹妹，依旧是斩刑，即使是和奸也是绞刑^①。

郑鄮被捕后，在狱中作《痛沥奇冤疏》，该疏带有辩护词的性质。郑鄮认为：“父亡八年，母亡五年之后，而突发难于吴越隔省，……首辅岂为人所误而不察？”除了自我辩护，称自己并未有任何不孝和逆伦行为外，郑鄮强调，此案告诉主体并不合法，因为举报人吴宗达是其堂舅舅，“臣母自有胞兄吴宗因，臣父亦自有胞兄郑振元，皆近八十老人，见在家乡，今本宗与亲嫡俱无间言，而独言于堂从之母族，不孝巨罪，岂以耳语耳遂可砌成也？”^{[22]320-321}郑鄮伯父郑振元亦上疏

①《大明律》卷一《名例》，“十恶”；卷十一《礼律》，“禁止师巫邪术”；卷二十《刑律三》，“殴祖父母父母”；卷二十五《刑律八》，“亲属相奸”。参见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213、388、450页。

为郑鄮鸣冤,但未被司法部门理会。尽管告诉主体不合法,但在皇帝的压力和首辅温体仁的操纵下,郑鄮仍难得幸免。崇祯九年(1636年),刑部初审郑鄮案后,由于证据不足,刑部尚书冯英认为“即如原参,无死法”^{[8]493}。冯英向思宗进行案情汇报时,认为“原参亦未指鄮之杖母也”,“旧辅吴宗达已故,无证可凭”^{[12]485-486}。因“语近回护”^{[11]258},冯英被思宗撤职,郑鄮被移交锦衣卫审理。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再审郑鄮案,依旧证据不足,无法审结。吴孟明为郑鄮“抗疏申辩之”^{[25]2339},结果吴孟明又被思宗撤职。思宗令东厂提督曹化淳组织会审郑鄮案。会审时,郑鄮四弟郑一谦出面举报郑鄮。郑一谦与郑鄮均是吴安人所生,其揭发和举报郑鄮的原因不得而知。郑氏家族认为郑一谦本身即是不法之人,为害乡里,其举报郑鄮的目的是“乘危攫金”^{[39]506}。郑一谦的举报,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炸响,使杖母案彻底坐实。

郑鄮最后被迫承认了“左道迫父杖母”一事,其余至死未招认。且不论郑鄮是屈打成招,还是出于维护父母声誉而违心招认,或是在其四弟举报面前的无奈之举,仅凭“杖母”这一项罪名,依照当时法律,刑部拟定郑鄮死刑,即顺理成章。只是此类犯罪《大明律》中未见处磔刑的规定,思宗命令加等,是明显的干涉司法之举。当然,在帝制时期,政法不分,皇帝一言九鼎,“加等”的行为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为何思宗对郑鄮恨之入骨,如此残忍地欲杀之而后快呢?

明思宗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皇位。即位伊始,魏忠贤一手遮天,其党羽遍布朝野。年仅十七岁,在朝中毫无政治基础的朱由检不露声色,“深自戒备”,阉党人人自危,内部迅速分裂。朱由检先将兵部尚书崔呈秀赶出中枢,断魏忠贤一臂,再解除魏忠贤提督东厂的职务,最后将魏忠贤发配凤阳,中途又派锦衣卫缉拿魏忠贤,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在京师,朱由检又笞杀客氏于浣衣局,诛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魏忠贤党羽^[45]。思宗从即位到铲除魏忠贤集团,仅用了不足三个月的时间,而且铲除魏忠贤集团的整个过程,几乎没费什么力气。思宗又通过“钦定逆案”,剪除朝堂中的阉党党羽,平反天启时期东林冤案。此举使东林党人感激涕零,阉党成员则对皇帝更加谨慎奉迎,不敢有任何疏漏和不敬。各种政治势力迅速倒向并依附皇权,思宗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皇权运行更加稳定,其行为无人敢干涉。崇祯二年(1629年)年底,思宗又将手握重兵的袁崇焕解除兵权,并于次年八月磔刑处死。明思宗除魏忠贤、杀袁崇焕的行动非常顺利,使他形成了刚愎自用、不可一世的性格。由此可能使他产生一种错觉,即他所认定的事,一定不会错。只要采用暴力和杀戮,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在其统治的十七年里,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尤其反感士大夫清议朝政。加之明思宗幼年丧母,即位次月即下诏追谥其生母为孝纯皇后^{[23]309},可见其对生母的怀念。思宗幼年的丧母经历,可能使其在心理上产生对不孝之人的仇视。思宗一贯标榜以孝治天下,听闻郑鄮“杖母”或“左道迫父杖母”的传闻,更是怒不可遏,因此决定对郑鄮案追究到底。

郑鄮被逮捕发生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磔刑执行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整个审判过程历时漫长。这期间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西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东北满洲不断侵袭寇边。由于思宗“恶私交而下滋告讦”^[46],朝堂中,廷臣“自东林与四明并峙,门户之水火所由来矣”^[47]。“明代士习,好逞意气,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48]东林与阉党及其他朋党依旧是意气之争,置内忧外患的时局于不顾,势同水火。“然而从东林党执政的措施来看,却暴露了致命的弱点,他们只是忙于‘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大批被黜的东林人。再则是打击异己,排斥宿敌齐、楚、浙、宣、昆诸派。而对迫在眉睫的军政大事,则束手

无策，暴露出东林党人长于政治批评家的气魄，而少于政治家的才能和风范。”^[49]而且“东林党对反对派成员的攻击和打击其实并不比对手来得温和”^[50]，朝堂中“门户纠纷”激烈，党争不休^{[23]335}。因此，思宗对朝中的党争和朝臣清议极为反感。

郑鄮案发后，名士刘宗周、黄道周皆上疏为郑鄮辩护。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刘宗周入朝，逾月，刘宗周上《痛愤时艰疏》，此疏虽然没有提及郑鄮之名，但直指朝中弊政。刘宗周认为，“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褻，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斂交困而盗贼日起”，要求思宗“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结果是“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51]6578-6580}。其后，刘宗周再次上疏直接为郑鄮辩护。他认为“据律文谓杖母之狱不可以无告坐”，公开指责思宗“不能容一狂直词臣，数起重狱，自此中外颇以言为讳，积成睽贰之端，甚非盛世之福”^{[39]506}。然而，思宗并未理睬，此疏留中不报。

黄道周于崇祯九年（1636年）回京复职。崇祯十年（1637年）大旱，黄道周以“异象”为由上疏言事，虽未明言郑鄮案，但黄道周指出，“上乐黷核，则下乐巉险；上喜告讦，则下喜诬陷。当此南北交讐，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不久，黄道周再次上疏，自称“品行高峻，卓绝伦表，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虑，远见深计，不如魏呈润；犯言敢谏，清裁绝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圜土累系之臣，朴心纯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鄮”。思宗见此奏疏后，“责以颠倒是非。道周疏辩，语复营护鄮。帝怒，严旨切责”^{[51]6595}。被思宗“严旨切责”后，黄道周毫无悔意，再次上疏，公开为郑鄮辩护，声称自己当年路过常州时，亲见郑鄮侍母至孝，所谓杖母一事，完全是捏造的谣言。而这种谣言产生的原因是“今乡党聚谈，好摘人暧昧以为笑乐，四方讹棍好造不根，调赫攫钱，风俗薄恶，犯乱所生”，解决的办法则是“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39]501-502}。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杨嗣昌等入阁，黄道周又上疏弹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思宗认为黄道周之疏“欲为郑鄮脱罪，下吏部行谴”。杨嗣昌借机反击黄道周，认为“鄮杖母，禽兽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鄮，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饰前言之谬，立心可知”。七月，思宗于平台召对内阁辅臣和相关大臣，黄道周依然是书生意气，不仅为自己弹劾杨嗣昌等的奏疏辩护，而且言语间又涉及郑鄮。此举立即遭到思宗的严厉批驳。事后，思宗对杨嗣昌说：“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无正乎？”思宗又传谕廷臣，“毋为道周劫持相朋党”^{[51]6596-6599}，将黄道周赶出京师，贬六秩，安置到江西按察司任照磨。

不难看出，思宗对刘宗周和黄道周的奏疏极为反感，特别是黄道周的行为，令思宗极为失

望。黄道周书生气十足,不仅指责朝政,而且还毫无依据地指责当时被思宗倚为栋梁、正如日中天的杨嗣昌。黄道周在与思宗当面辩论时,又有意无意地联系到郑鄮,继而为郑鄮公开喊冤。他的行为,让思宗在阁臣面前非常难堪,只能徒增思宗对黄道周的反感和对郑鄮的厌恶之心。可见,思宗执意置郑鄮于死地,也有抑制黄道周、刘宗周,压制朝堂清议之意。

郑鄮系狱后,郑家人试图营救郑鄮。一方面由郑鄮伯父郑振元上疏为郑鄮辩护、鸣冤,另一方面则“以万金乞周奎通皇后关说”。结果,周皇后刚提到“常州郑鄮”,立即遭到思宗的严厉斥责,周皇后“惧而止”^{[11]263}。

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认为郑鄮案证据不足、无法结案,遂被思宗以“不能治狱”为由罢官。被罢官后的吴孟明愤愤不平,上疏称:“郑鄮一事,世远人亡。皇上必欲立置重典,以风示天下。近常州有钱霖父子戕杀之事,远近骇闻,许燝既伏义发愤,何舍目前之钱霖而追已往之郑鄮?”^[52]然而,吴孟明此举却是“好心办坏事”。他并未弄清思宗穷追此事,必杀郑鄮的原因,仍一厢情愿,试图以倒逼思宗的方式解救郑鄮,结果彻底激怒思宗,“趣锦衣卫上郑鄮狱”^{[17]5716}。可见刘宗周、黄道周、吴孟明先后上疏营救,以及郑家试图通过周皇后求情之举,不仅未能减轻郑鄮的刑罚,反而成了郑鄮的“催命符”。

四、结语

郑鄮案的发生,既是郑鄮性格狂傲,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所致,正如郑鄮临终所言,“世间杀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杀者莫如口”^{[14]877},可惜“待到清醒时,已踏黄泉路”;又有其在乡诸多不法行径,导致自身乡评极差而罹祸的因素。同时,郑鄮案的发生也是晚明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使然,而思宗刚愎自用的性格和有意抑制士大夫清议朝政的心态,则是促成此案的关键因素。

郑鄮死后,朝中的党争、士大夫清议并未因此案而终止,明王朝也于五年后土崩瓦解。郑鄮案发生后,当时的名士黄道周、刘宗周多次上疏为郑鄮鸣冤;黄宗羲也曾为郑鄮撰写过墓表。清代常州士人陆继辂、汤修业等一直为郑鄮鸣不平;直至民国前期,常州乡贤钱振鏗等还撰文试图为郑鄮洗冤。然而,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遗民徐树丕等江南名士则对郑鄮极为反感,认为郑鄮之死是罪有应得。之所以一个并不复杂的郑鄮案引来如此多的争论,是因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中,夹杂了记载者诸多的主观因素。特别是晚明时期的士大夫,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党争思想是左右其记述客观性的很重要因素。清初关于明代历史的记载,创除“文字狱”的因素,相当一部分历史文本的记述者为东林、复社成员或其后人、门生,这些人在历史记述中,特别是反思晚明政治和明亡原因时,有意将敌对朋党人员污名化,而对东林人士则有意剔除不利其历史评价的记载。这也就是关于明末同一事件,往往形成截然不同、相互抵牾的文本记载之原因。因此,在进行晚明史研究时,史学研究者必须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仔细地分析和辨伪,避免出现一叶障目及“为尊者隐、为亲者讳”的行为。

参考文献:

- [1] 王绍徽. 东林点将录 [M] // 四库存目丛书: 史部第 107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694.
- [2] 樊树志.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鄮父子 [J]. 文史知识, 2003 (12): 68-76.
- [3] 宇文思理. 明季郑鄮案 [J]. 山海经, 2016 (5): 17-18.

- [4] 郑礼炬. 黄道周逸诗文辑佚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 36-43.
- [5] 陆林. 金圣叹与武进许氏兄弟交游考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4 (1): 43-50.
- [6] 吴琦, 马俊. 晚明乡宦与乡评之互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 119-129.
- [7] 王森威. 明代锦衣卫指挥使研究 [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5.
- [8] 郑鄮. 荃阳草堂文集: 卷十六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126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9] 郑鄮. 荃阳草堂文集: 卷十四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126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10] 朱保炯, 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1] 计六奇. 明季北略: 卷十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2] 茅元仪. 三戌丛谭: 卷二 [M] //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 113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3] 陆以湜. 冷庐杂识: 卷五 [M] //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 114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531.
- [14] 抱阳生. 甲申朝事小纪四编: 卷九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 [15] 蒋平阶. 东林始末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61.
- [16] 曹溶. 崇祯五十宰相传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119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15.
- [17] 谈迁. 国榷: 卷九十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8] 黄宗羲. 郑荃阳先生墓表 [M] //黄宗羲全集: 第 10 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271.
- [19] 陆继辂. 合肥学舍札记: 卷十一 [M] //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 115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396.
- [20] 梁章钜. 浪迹丛谈: 卷六 [M] //续修四库全书: 子部第 117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21]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 卷五十八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114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22] 郑鄮. 荃阳草堂文集: 卷一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126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23] 张廷玉. 明史: 卷二十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4] 文秉. 烈皇小识: 卷二 [M]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43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25] 夏燮. 明通鉴: 卷八十四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26] 张廷玉. 明史: 卷三百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7] 张廷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530.
- [28] (康熙) 常州府志 [M]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第 36 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183.
- [29] (康熙) 武进县志: 风俗 [M].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
- [30] 吴宗达. 吴文端公涣亭存稿: 卷二十一 [M]. 南京图书馆藏清刻本.
- [31] 张廷玉. 明史: 卷二百四十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310.
- [32] 万斯同. 明史: 卷四百三 [M]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33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353.
- [33] 张廷玉.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 卷十五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第 340 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285.
- [34] 王世德. 崇祯遗录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第 72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35] 顾天竣. 顾太史文集: 卷四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9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79-80.
- [36] 陆世仪. 复社纪略: 卷三 [M]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43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521.
- [37] 李清. 三垣笔记: 笔记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8]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卷十三 [M]. 黄汝成, 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800.
- [39] 郑鄮. 荃阳草堂文集: 附录 [M]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第 126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40] 徐树丕. 识小录: 卷二 [M]. 涵芬楼秘笈影印本.
- [41] 王弘. 山志: 二集 [M]. 何本方, 注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264.
- [42] 夏允彝. 幸存录: 卷中 [M]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44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536.
- [43] 赵吉士. 续表忠记: 卷一 [M] //周骏富. 明代传记丛刊: 第 36 册. 台北: 明文书局, 1991: 487.
- [44] 顾炎武. 陆贡士来复述昔年代许舍人曦草疏攻郑鄮事 [M] //王冀民. 顾亭林诗笺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598.
- [45] 张廷玉. 明史: 卷三百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824.
- [46]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卷七十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210.

- [47] 文秉. 定陵注略: 卷十 [M].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
- [48] 蒋逸雪. 张溥年谱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130.
- [49] 冷东. 叶向高与明末政坛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111.
- [50] 苗棣. 魏忠贤专权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15.
- [51] 张廷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2] 文秉. 烈皇小识: 卷三 [M]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43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95.

A Scholar-Bureaucrat from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the Whirlpool of Party Struggle and Village Judging —A Case Study of Zheng M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ü Yang

Abstract: Zheng Ma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ecause he was accused of tempting his father to tonsure, forcing his father to rod his mother by dishonest means, raping his daughter-in-law and committing incest with his young sister. Through the combing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it is found that the accusation of Zheng Man is ill-founded. There are too many mistakes about Zheng Man case in *MingJiBeiLue* compiled by Ji Liuqi. In fact, the main reason for Zheng Man's death is that he had little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was caught in the whirlpool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struggle. Due to his many illegal behaviors in the hometown and arrogant personality, village judging about him was always very terrible. He even received a lot of criticism within Dong Lin party.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Zheng Man's death were emperor Sizong's headstrongness and dislike of party struggl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he wanted to control Huang Daozhou through this case to suppress scholar-bureaucrats' behaviors of carefree talks about state affairs, so the four charges were only excuses.

Keywords: Zheng Man; rod one's mother; Wen Tiren; village judging; party struggle

(收稿日期: 2018-11-27; 责任编辑: 陈鸿)